

加勒比英语文学中华兹华斯《水仙花》的殖民隐喻解读

张建萍

(中国民航大学外国语学院 天津 300300)

摘要: 隐喻的本质是理解或者经历另外一种事物,具有“桥梁”的作用。殖民者通过隐喻将本国的语言文化传输到遥远的殖民地,以此同化殖民地原有的语言文化。但隐喻还有变异性,当隐喻被传递到殖民地时,常常会产生出与殖民者预期相反的解读。在英国对加勒比的殖民统治中,华兹华斯的诗歌《水仙花》是常常被借用的隐喻,其目的是让加勒比殖民地“水仙化”,但它在加勒比本土的解读过程中遭遇了变异。本文具体分析了加勒比英语文学中关于《水仙花》的种种解读,目的在于深究《水仙花》遭遇种种变异解读的原因。作为殖民隐喻的水仙花因本身具有变异性,反而成为反殖民的隐喻,在殖民者的意图和殖民地对《水仙花》的变异解读之间形成了“水仙鸿沟”。因此,我们应对各种殖民形式的深刻性进行更深入全面的思考,这正是本篇论文的结论及意义所在。

关键词: 殖民主义; 隐喻; 水仙化; 水仙鸿沟

[中图分类号] I1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539(2014)08-0048-07

Colonial Interpretation on the Metaphor of *Daffodils* in Caribbean English Literature

Zhang Jianp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ivil Avi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Tianjin 300161, China)

Abstract: Because metaphor enables people to share the experience or understand things in a faraway place, it is often adopted as the conspirator of colonialism. With the help of its function as a bridge, colonizers could transfer their languages and cultures to the colonized and assimilate the original ones. Moreover its variability of metaphor makes it undergo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after being received by the colonized. The poem of *Daffodils* by William Wordsworth as a metaphor is intended to ‘daffodilize’ or assimilate the Caribbean colonies. Based on the various interpretations of *Daffodils* in Caribbean English Literature,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reason why it had been deconstructed and reinterpreted. ‘The daffodil gap’ shows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olonizer’s colonial intention and the decolonization of the colonized. Therefore, this analysis intrigues the profound thinking on ways of colonialism in the colonized culture.

Key words: colonialism; metaphor; daffodilize; the daffodil gap

一、引言

弗朗兹·法农(Franz Fanon)曾说过:“不同的语言文化意味着不同的世界”(赵稀方, 2009: 161)。因此,对于殖民统治而言,语言文化的作用往往胜过坚枪利炮。殖民者在殖民地

普及自己的语言文化,虽是对异质文明的传播,但更是加强其殖民统治的核心手段。但时空距离使得殖民地人们对于这些来自遥远异地的语言文化总是非常陌生,所以如何让这些语言文化在殖民地实现本土化是殖民者常常思索的问题。隐喻则是他们常常借助的工具,因为“隐喻的本质是理解或者经历另外一种事物”(Lacoff &

[基金项目]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全球化背景下卡里尔·菲利普斯的流散思想及其演变研究(13YJC752034);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中国民航大学专项:后现代视阈中流散身份的感与解——菲利普·罗斯“祖克曼系列”作品研究(ZXH2012F009)阶段性研究成果。

[收稿日期] 2014-3-10

[作者简介] 张建萍(1978~),女,山西洪洞人,中国民航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英美文学与文化。

Johnson, 1980: 5), 在语言文化传播方面, 它作为“桥梁”将殖民者和殖民地连接起来的同时, 还借助于各种殖民手段, 最大程度地将殖民者的语言文化融入到殖民地文化中。

在英国对加勒比的殖民统治中, 威廉姆·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的诗歌《水仙花》(*Daffodils*)常常被用作隐喻。这首诗歌原本描述了诗人回忆与其妹在郊游时看到美丽的水仙花盛开的难忘景色, 也因其脍炙人口、充满美感的意象、朗朗上口的语言和简洁工致的韵律, 表现了诗人强烈的感情, 因而被誉为英国浪漫主义抒情诗的典范(袁宪军, 2004: 56)。诗歌《水仙花》在西方文学中一直备受追捧, 而在英国对加勒比等地的殖民统治中, 背诵这首诗歌甚至成为英属殖民教育体系中固定的必修内容。英国将《水仙花》推广到殖民地意在对其进行同化式的殖民教育, 基于此, 这首诗歌也常常被视为英国殖民统治的隐喻。几乎在英语世界中的每个角落都会学习这首诗。J. A. 曼干(J. A. Mangan)将对其的学习称为帝国的课程, 是殖民地被殖民的标签。可以说通过学习《水仙花》, 英国实现了对殖民地语言与文化的同化。为了区别, 在本文中, “水仙花”指的是以文化殖民为目的殖民教育, 《水仙花》指这首诗歌本身, 而水仙花则为这种植物本身。

隐喻传达的是一种远距离的、未曾谋面的事物或者未曾经历的经验, 所以它一直是社会文化概念得以表达和传播的重要途径。但隐喻所传达的事物或者经验的真实性有待考证。从400多年前的路易斯·韦弗斯(Luis Vives), 到现代认知语言学家凯瑞·拉科夫(Gary Lakoff)和马克·琼森(Mark Johnson), 他们都认为所有的知识, 无论是科学的、历史的还是文学的, 从隐喻的角度来看, 都不能给我们提供绝对的真相。这是因为隐喻是动态的、有繁殖能力的, 而且在它不断地再现遥远、陌生事物和经历的同时, 又不断地发生着变异。有些变异的、全新的解读与殖民目的保持了一致, 有些则与其大相径庭。如英殖民者原本希望通过殖民教育将殖民地“水仙化”, 但因加勒比特殊的气候所致, 当地人们从来没有见过真实的水仙花, 这种物种上的“缺席”让其在殖民地文学作品中成为一种变异的、

抽象的隐喻。在加勒比英语文学中, 诗歌《水仙花》、“水仙花”式的课程和水仙花本身不断地出现, 同时也不断地被再次解读, 其目的是抵抗殖民统治。可以说, 隐喻能够跨越时空传递事物和经验的本质使其成为殖民统治的共谋, 但它也因此又被殖民者赋予反殖民主义的特质。

二、“水仙化”: 殖民隐喻

殖民体系之所以选中《水仙花》, 除了它在英国文坛中不可动摇的地位之外, 还因其蕴含着“拯救”主题。对于西方文化而言, “拯救”是来自《圣经》中的宗教概念, 包括《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在内的《圣经》总体上都是在讲述上帝引导和拯救人类的历史。《水仙花》同样也隐含了这种与其一致的“拯救”主题。对于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来说, 自然界是他真正的伊甸园。从剑桥毕业后的他曾在伦敦小住过一段时间, 在耳闻目睹了伦敦城光怪陆离、纷繁杂乱的世俗生活后, 他苦恼不已, 进而认为只有回归风景优美的大自然, 人类才能抛去俗世的羁绊, 重新接受精神的洗礼。因此他的诗歌总是向人们展示一种只有拥抱自然才能够寻找到拯救和解放心灵之路的主题。《水仙花》也是如此, 当作者徜徉于水仙花海时, 精神倍增, 如同新生。而《水仙花》的“拯救”主题又正好顺应了英国殖民统治的需要。在其殖民统治中, 殖民地往往被其描述为落后的、野蛮的、同时期被代表高雅的英国文明所拯救的对象。选择《水仙花》作为殖民教育体系中必修课程的内容意在暗示英国对于殖民地的统治是对其的“拯救”, 而非殖民统治, 而这从本质上讲是对殖民统治行为的掩饰。

除了《水仙花》的文学地位和“拯救”主题与殖民统治者的需求一拍即合外, 华兹华斯的思想同殖民主义也有着契合之处。或许因为浪漫主义给予我们的印象是不食人间烟火的, 虽然他因推崇心灵解放与自由而成为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 但中外学界对于其蕴含的政治和殖民思想了解甚少, 而我国学者对于这一方面的讨论更是几乎没有。有些前卫的学者注意到了这一点, 著名的评论家M.H. 艾布拉姆斯(M.H. Abrams)认为华兹华斯是位“政治和社会诗人”(Day,

1996: 132), 只是他将自己的政治思想与浪漫主义巧妙地进行了融合而让人难以觉察。以其诗歌《丁登寺》为例, 表面上, 华兹华斯给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冠以“漂泊的旅人”和“隐士”的美名,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 他也是在掩盖贫富两极分化的英国社会中人们穷困潦倒的事实。因为诗歌披着浪漫主义的外衣, 我们逐渐忘记了当时英国到处都是乞讨和流浪穷人的社会现实, 而逐渐认同了诗歌中作者给我们呈现的虚假幻境, 那就是隐士应当主动选择贫穷, 而流浪汉则应无奈地承受贫穷 (Day, 1996: 43) 《丁登寺》中对自我和自然的理想化描写掩藏了由于工业革命对穷人的掠夺而导致的社会贫困状况和环境污染等一系列严峻残酷的社会现实。因此很多学者认为浪漫主义具有殖民主义性质。

而华兹华斯的殖民思想还可追溯到其1802年的《抒情歌谣集》(*Lyrical Ballads*)的《序言》, 在《序言》中, 能够映射他将殖民思想融入浪漫主义中的表现有三。首先, 他不断地强调模仿的作用。这种对模仿的宣传与英国在加勒比等殖民地强迫本土学生使用英式英语背诵《水仙花》如出一辙。其次, 华兹华斯呼吁对落后的、粗野的人进行改造, 使其最终变成文明人, 这是在强调西方殖民者文化高于殖民地文化的优越性, 同时希望当这种优越性通过隐喻被传送到殖民地后, 殖民地人们会对从来没有亲眼所见的殖民者的本土文化产生亲近感, 而以此达到殖民者对殖民地同化的目的。第三, 在《序言》中, 华兹华斯认为一种语言能够被另一种完全陌生的语言所代替, 这本质上是构建殖民统治和隐喻之间的联系。乔恩·科兰契尔 (Jon Klancher) 曾认为“华兹华斯实际上是在无意识地推动从自己语言的网格中产生了另外一种语言” (Klancher, 1987: 141)。他还认为华兹华斯是在“寻找一种异国的文化, 一种陌生的社会的语言, ……”, 并设法使这些异域文化对西方起不到威胁的作用” (Klancher, 1987: 147)。而如何让这些异域文化熟悉西方语言, 又不会威胁其地位, 殖民隐喻便是便捷的桥梁。其中《水仙花》便因其丰富的殖民内涵成为最著名也是最常见的隐喻之一, 而所谓“水仙化”是指英殖民者希望通过隐喻同化殖民地文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与水仙花在

加勒比殖民体系中所代表的“缺席”的、强迫模仿的、同时也代表孝顺关系的隐喻内涵有关。

1. “缺席”的隐喻

因气候的原因, 英国是个适宜水仙花生长的国度, 尤其到了每年的三四月份, 整个英国简直就成了水仙花的海洋, 因此英国人对水仙花总有着特别的爱好。但水仙花并不适合生长在位于热带的加勒比地区, 对当地人来说, 这是一种他们从未见过的、地理上“缺席”的植物。水仙花在英国的普及与其在加勒比的“缺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但在许多的英国作家, 如华兹华斯看来, 作家的任务就是“让那些‘缺席’的事情呈现得如同在场一样” (Smith, 2002: 806), 因此, 英国殖民文化坚持认为, 让加勒比人接受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水仙花并非难事, 只要借助于隐喻, 因为隐喻是“在场”和“缺席”之间的桥梁, 可以让人们理解、接受或经历“缺席”的事物。而作为物种之一的水仙花又因其在加勒比地理上的“缺席”成为反殖民主义的隐喻。

加勒比作家的作品中常见关于水仙花在物种上“缺席”的叙述, 但伴随着“缺席”的往往是通过被殖民者的视角使得水仙花成为反殖民统治的隐喻。加勒比人并非如同殖民者所预期的那样, 充满了对于水仙花的喜爱, 反之他们非常厌恶这种植物。牙买加女诗人罗娜·古迪森 (Lorna Goodison) 写道: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 我一直是憎恨那首诗歌的, 我认为华兹华斯写得太愚蠢了, 一首花儿竟然写了那么多, 而且这种花儿我还从来没亲眼见过” (Goodison, 1990: 291)。同样的, 牙买加·金凯德 (Jamaica Kincaid) 在“植物谱系” (*Plant Parenthood*) 一文中不断地解释着自己对水仙花的感受: “我不喜欢水仙花, 这并不仅仅是美学上的原因, 从更严肃的角度来看, 我是在被迫背诵一首关于水仙花的诗歌, 而我在出生成长的地方, 从小到大却从来没有见过这种花儿” (Kincaid, 1995: 46)。金凯德之所以对水仙花愤怒, 根源在于她被迫崇拜一种在她生活中一直“缺席”的东西。而在她的小说《露西》 (*Lucy*) 的第二章中, 十几岁的小孩露西从加勒比来到美国, 寄宿在玛丽安 (Mariah) 的家里, 露西和玛丽安的关系十分融洽。露西在美国度过

的第一个春天,玛丽安带她到花园里,当看到水仙花的时候,她问露西,“你见过水仙花吗”,“当它们开花的时候,常常簇在一起,香味飘来,……,你见过它们吗?”(Kincaid, 1991: 17)。露西描述了玛丽安看到水仙花时的兴奋,“她带我到了花园,这个地方是世界上她最喜欢的地方之一”(Kincaid, 1991: 28)。在玛丽安的眼里,“水仙花被放在屋里的各个角落……它们向着世界微笑,给人的感觉是它们能够看到世界上美好的事情”(Kincaid, 1991: 12)。但露西第一次看到水仙花的感觉却与玛丽安大相径庭:“峰回路转之处有许多粗疏管的,高大的树木,沿着路边和树木下面,有许多许多黄色的花朵,它们的大小和形状像茶杯一样,或者像仙女裙一样”(Kincaid, 1991: 29)。玛丽安对水仙花的喜欢,让露西困惑不已,“到底是什么会让她们这么喜欢水仙花?”(Kincaid, 1991: 17)她在加勒比从来没有见过水仙花,水仙花和诗歌中的文化对她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事物:“玛丽安,我从10岁起就背诵这首诗,但这种花儿我从来没有见过,直到今天,我19岁了才得以一见”(Kincaid, 1991: 30)。在米歇尔·克里夫(Michelle Cliff)的《阿本》(Abeng)中,女主人公同样说道:“《水仙花》这首诗歌非常愚蠢,讲述的是一种她从来没有见过的花朵”(Cliff, 1995: 129)。“数以百万的学生要求必须背会这首诗,但他们除了在图片上,从来没有见过这种花儿,因此学生们也不明白诗人为什么会被这种花所吸引”(Cliff, 1995: 85)。水仙花在加勒比是一种“缺席”的植物形象,其实不仅仅是水仙花,在V. S.奈保尔(V. S. Naipaul)叙述的关于茉莉花的一则故事中写道,自己虽然对茉莉花这种植物的名称很熟悉,但从来没有见过这种花的样子,因此茉莉花对他而言,“只是书中的一个单词而已”(Naipaul, 1984: 31)。

水仙花在加勒比的“缺席”是隐喻进行变异和加勒比英语文学对其进行异化处理的基础,正是由于这种物种的“缺席”,加勒比文学对《水仙花》产生出以反殖民统治为特征的种种解读。

2. 强迫模仿的隐喻

殖民教育在殖民统治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而文学又是殖民教育重要的、核心的

形式之一。J. 爱德华·查姆柏林(J. Edward Chamberlin)认为,“欧洲帝国都认为语言是帝国的工具,而教育又是语言的工具,其中文学被认为是语言最流利的表达,因此它必然的是教育的核心”(Chamberlin, 1993: 75)。而文学教育与文学不同,“文学教育……是处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内部的生产行为”(Eagleton, 1976: 56)。因此殖民者对殖民地的文学教育常常被认为是一种殖民体制的主要支持系统。

尽管加勒比并不生长这种植物,《水仙花》依然能够被选中成为英国在加勒比殖民教育中固定的必修内容,并且殖民者强迫加勒比学生以背诵这首诗歌为豪。金凯德在《我喜欢的植物:作家和园艺家喜欢的植物》(My Favorite Plant: Writers and Gardeners on the Plants they Love)和《我的园艺书》(My Garden Book)中都表达了自己对于植物的热爱,但这种热爱却来自自己被迫切接受的殖民文学教育。“我清楚地记得,我的植物学老师是个严厉的英国女人,虽然她很严厉,植物学依然是我在学校非常喜欢的课程之一,另一门我喜欢的课程是历史”(Kincaid, 1993: 50)。同时她还附带说明,“我并不喜欢水仙花,但它是英国的遗留之物,我不得不背诵这首诗歌,从我还是个孩子时就开始背诵这首诗歌”(Kincaid, 1993: 51)。在《露西》中,金凯德描述了露西背诵《水仙花》时的回忆,“我依然清晰地记得我在10岁时背诵这首诗歌的情景,当时我是维多利亚女王女子学校的一名学生,我必须记住它,甚至于每一小节,同时还要在礼堂里当着所有学生、学生父母和老师的面背诵”(Kincaid, 1991: 18)。在克里夫的《阿本》中,女主人公回忆起文学老师让她们背诵《水仙花》的情景,因为这是英国教育官方的命令,同时还要求学生朗读和背诵时“尽量不要带有加勒比口音”(Cliff, 1995: 85)。加勒比学生在公众场合朗诵或者背诵《水仙花》是一种强制性的殖民同化行为,而台下聆听的观众则充当了殖民者的身份。也因此,当露西后来在美国第一次见到水仙花的时候,并无欣喜之感,因为水仙花代表了自己曾经遭受的殖民教育的压迫。

加勒比人极端厌恶这种在物种上“缺席”、却因强迫性的殖民教育不得不学习的《水仙

花》。如露西第一次看到水仙花时，并不像玛丽安一样兴奋，心里想的是“我不知道这些花是什么，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想毁坏这些花儿，真希望有把巨大的镰刀让我可以沿着道路，将它们拔起来”（Kincaid, 1991: 29）。“我如何跟玛丽安解释我对这些黄色水仙花的情感？”（Kincaid, 1991: 29）。水仙花激起了长期隐藏在她内心深处创伤，而毫无疑问，这与强迫模仿的“水仙花”课程密切相关。

3. 孝顺关系的隐喻

英国殖民主义来自其历史上的“维多利亚主义”（Victorianism）。“维多利亚主义”的特点是“伪科学的种族主义”（pseudo-scientific racism），即认为肤色是划分人种优劣的唯一标准，这是为英帝国的殖民行径合法化寻找的借口，同时殖民者将黑人种族，尤其是非洲人归类为最粗鲁的、最原始的群体。为维护英国白人种族至高无上的地位，也为了殖民统治的需要，殖民者常常大肆宣传它们与殖民地之间的“孝顺关系”，即殖民者英国被神圣化为崇高的、富有的“母亲”，而殖民地人民则是期待着被其教化的子女，因此，殖民者对殖民地人们进行统治，而殖民地对于殖民者的绝对服从、膜拜乃至模仿都是理所当然的。“孝顺关系”是殖民时期殖民者和殖民地之间典型的隐喻。“孝顺关系”也体现在“水仙花”式的强迫性的殖民教育中，这种强迫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二者之间的“孝顺关系”。

《水仙花》向加勒比人展示了一种田园牧歌式的前工业社会的英国画卷。在小说《露西》中，露西在学习这首诗歌时产生了“一种对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中的理想场景的渴望……这种渴望正是对英国的渴望，也就是渴望去英国”（Bonetti, 1992: 131）。这种殖民体系中对英国文化赞美式的描述让加勒比人将英国视为自己的母亲之国，“她非常美丽、优雅、有教养，同时还受过教育”（Levy, 2004: 139），这种“孝顺关系”使得殖民地人们在情感上依赖着殖民者，正如安德里亚·列维（Andrea Levy）《小岛》（*Small Island*）中的吉尔伯特在谈及自己二战时前往英国的感受时说的：“有一天，你听到了母亲的召唤——她遇到了困难，需要你的

帮助。你的妈妈、爸爸都准备去，你们于是离开家和周围熟悉的一切。乘船走海路，晕船、还有遭受着疲倦、饥饿、寒冷的威胁，但是这些都不能够阻挡你帮助母亲的决心”（Levy, 2004: 139）。为了援助二战时的英国，连加勒比妇女都参与到援助活动中来，她们编织袜子和围巾，甚至捐出零用钱帮助英国购买飞机。同时，众多加勒比青年男子报名参军，帮助英国抵抗希特勒的入侵。在登上前往英国的“帝国顺风号”轮船时，加勒比移民的心情激动无比，“将要成为英国公民了，可以用英国护照到处旅行了，……，心中的英国沐浴在阳光之中”（Levy, 2000）。这种“孝顺关系”不仅体现在殖民地人们对殖民者之间绝对的孝顺和尽忠的关系上，英国殖民者还根据加勒比人对《水仙花》的模仿程度将黑人分为中产阶级和劳动阶级，这样的划分可以筛选出与普通民众疏离、又与欧洲文学文化保持一致的黑人阶级，他们将这部分黑人赞誉为能履行“孝顺关系”的“子民”，这些“子民”充当了英国殖民统治的同谋。这也是隐喻在殖民统治中所起作用的体现。

许多加勒比作家都敏锐地觉察到这种通过隐喻来进行的殖民同化，他们通过创作表达着自己的态度。在《露西》中，露西回忆道：“还是个孩子的时刻，我就开始背诵华兹华斯、济慈等英国诗人的诗歌，我感觉他们力图使我变成某种类型的人”（Bonetti, 1992: 130）。在列维的《小岛》中，霍腾斯教育自己的外婆应当像英国女王一样说话。她教外婆朗读自己学到的《水仙花》，外婆聚精会神地模仿着她发出的每一个音调，而霍腾斯也仔细地观察外婆发音是否正确。霍腾斯的行为表明了其对英国文化的认同和渴望。同样，米恩拿卡西·穆克尔基（Meenakshi Mukherjee）回忆了她青少年时曾希望被“水仙化”（1993: 112），在加勒比所接受的英式教育让她可以讲一口流利优雅的英语，而这些竟让她充满了优越感，但这种优越感的存在又使得她刻意地与其他黑人疏离。

《水仙花》的浪漫主义和“拯救”主题、水仙花在物种上的“缺席”，加上以宣传孝顺关系为目的的“水仙花”课程，这些都为英殖民统治蒙上了温情的面纱。因此，殖民统治中的隐喻制

造了一种虚假的教育文化,但归根到底都是为了达到殖民统治的目的。

三、“水仙鸿沟”:反殖民的隐喻

凯瑞·拉科夫和马克·琼森认为隐喻“的力量在于……创造一种现实,而不是简单地硬塞给我们一种已预先存在于世界的概念化的方式”(1980:144)。也就是说,隐喻的产生并不是固定的,其构成过程是多变的。正如艾勒克·博赫姆(Elleke Boehmer)所指出的,“被组织起来的隐喻”构建出的是一个‘充满迷惑的世界’”(2005:15),当重组后的隐喻被置于新的土地上时,必然会改头换面,被重新阐释。因此,当《水仙花》被加勒比作家进行解读时,它又成为了一种反殖民统治的隐喻。与此对应的是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借用拉康的理论所提出的“殖民拟仿”(colonial mimicry)理论。“殖民拟仿”指身处殖民地的作家在重新再现殖民者的语言文化时,往往会采用模仿、反讽等手段来解构殖民者所建立的殖民主义。加勒比作家对水仙花的描述正是一种具有抵制性的“殖民拟仿”行为,如果说通过《水仙花》,殖民者期望使殖民地人们“水仙化”,而殖民地文化则利用这种隐喻,制造出一种使用同一隐喻,发生在殖民者和殖民者之间的“水仙鸿沟”(Tiffin, 1993: 920),这种鸿沟反映了殖民地的反殖民主义趋势。

“水仙鸿沟”在加勒比文学作品中无处不在。英国殖民教育采用“水仙花”式课程进行了殖民统治,加勒比文学家对该隐喻进行了改编,使其成为一种逆向的反抗方式。米歇尔·克里夫在《阿本》中将水仙花改编成木槿花,“许多孩子都认为它是深红色的,就像木槿花一样”(Cliff, 1995: 129)。孩子们将这种从来没有见过的花与牙买加本土的木槿花联系在一起。而一些来自殖民地的学生,比如佳那C. 桑噶(Jaina C. Sanga),问及老师现实中水仙花的样子时,印度老师试图将它画在黑板上画出来。“当然,老师也没有见过水仙花,因此也不能画出一个完全真实的水仙花。老师转向学生说,‘没关系,我们可以改变它。将水仙花改成茉莉

花。它们之间没有差异。而且你们都知道茉莉花长成什么样子’”(Sanga, 2001: 10)。而在《小岛》中,安德里亚·列维同样对水仙花进行了改编,霍腾斯教外婆“水仙花”,但是无论她如何努力地去教,外婆读这首诗歌时都带着加勒比口音,同时老师也认同水仙花就是木槿花或者茉莉花。水仙花被本土化为别人可以理解的实物。这种可改编性正是隐喻的变异本质所赋予的,同时也是文本在遭遇现实之后的一种妥协。而这种改编正是对强加于殖民地文化“缺席”隐喻的反殖民行为。

四、结束语

语言文化在殖民统治中的影响十分深远,虽然英帝国已经没落,但英语及其文化却得到了世界性的推广。米耐特·马林(Marin Minett)说道:“虽然我们失去了帝国,但是我们赢得了通用语”(Marrin, 1998: 26)。在英国的殖民文化普及中,隐喻所起到的作用不可小视。隐喻可以跨越时空的距离,理解其他文化、经历遥远地方的事物或事件的本质,因而成为了殖民主义的共谋者。但因隐喻本身具有变异性,因此,殖民者隐喻在传递到殖民地后,往往会在殖民地文学中产生与殖民者预期相反的解读。英殖民者希望通过“水仙花”式的课程使殖民地“水仙化”,但水仙花在加勒比的“缺席”使得它本身又成为一种反抗隐喻,经过加勒比文学不断地解构和重新阐释,在殖民者和殖民地对《水仙花》不同的解读之间形成了“水仙鸿沟”。加勒比英语文学中对《水仙花》反抗式的隐喻表达说明殖民地人民对于殖民统治本质的认识更加深入,他们不再停留于表面,而是深刻思考各种殖民形式,并寻找深层次、多形式的反抗方式。

文学的力量在于改变基于隐喻的社会,而隐喻又是各种矛盾、对立和变异因素的混合体。因此,隐喻成为文学改变社会的主要力量。对个人而言,对同一事物新的理解可以导致人生轨迹的改变;而从集体的角度来看,当众多个体对新事物的新认知相互重叠时,就会形成“常识”,而这种“常识”会通过公共思维或者真实世界可察觉的修改最终导致社会变革。

